目　录

热忱支持“温州模式” 1
对温州第一阶段改革的回顾 11
温州“两户”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萌芽 16
坚持改革试验 大力促进温州民营企业发展 21
亲历温州改革开放 35
温州市率先实行一体化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48
促使市场从无序转向有序 52
进一步加深对市场经济发展过程的认识 56
今日温州与温州人 61
尊重群众首创精神 65
改革需要勇气和智慧 70
早春时节的报春花 77
十年求索路 ——《苍南县股份合作企业章程》出台前后 83
温州试验私营经济立法回顾 87
无私无畏 浩气长存 ——深切怀念为改革而奉献的董朝才书记 ...91
温州试验区的建立与改革试验的成就 100
我与中国第一农民城 110
东方起动点 120
　第一章 强反差 120
　第二章 商品王国漫记 124
　第三章 乡镇风情画 143
　第四章 “自由生态”录 155
　第五章 理论在“模式”的运动中困惑 163
温州与温州人 176
历史与现实交叉点上的温州 197
中国的第一座农民城 210
　第一章 入城前奏 210
　第二章 梦中的城 213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三章 土地的价值 219
第四章 向富裕地区层层转移 222
第五章 新城的农民对他说…… 224
第六章 明暗的交错 228
来自温州的故事（节选） 231
小 引 231
首 篇 232
治政篇 233
治安篇 237
经济篇 243
建设篇 255
尾 篇 259
中国改革的试验区——“温州模式” 261
在“纽扣王国”里 278
驮在“菲亚特”背上的温州 297
“中国第一皮鞋城”扫描 320
活力——“鞋城”风景线 335
中国：一个夏天的访问（节选） 346
温州形象（节选） 352
梦巴黎（节选） 355
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温州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 369
西进大军团 ——温州人投身中国西部大开发的报告 373
温州人在上海 395
温州商会——第三力量的崛起 426
温州十问 ——哪里有生意哪里就有神奇的温州人 446
聚焦在上海的温州老板 463
温州告诉我们 479
是是非非温州人 505
编后小记 514

热忱支持“温州模式”

王 芳

温州，原本是浙江的一个中等偏下的城市。在改革开放的岁月，温州人敢为天下先，成为经济改革的排头兵，名震全国，远播海外。在欧洲，只要说“我是温州人”，欧洲人马上就明白；如果说“我是浙江人”，欧洲人反而要问“浙江在哪里”。

据历史文献记载，温州地处浙江东南沿海，比邻闽北，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港口城市。素有东南邹鲁、侨胞之乡、手工业名城之称。

早在春秋战国时，温州港即成为全国九个重要港口之一。汉惠帝三年（公元前 192 年），勾践裔孙驺因佐汉灭秦有功被封为东海王，都东瓯，俗称东瓯王。东晋太宁元年（323 年），置永嘉郡，为温州建郡之始，同时请郭璞规划建城，恰有白鹿衔花过境，故称白鹿城。东晋南朝时期，北方人民因战乱大批南迁，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谢灵运、颜延之、邱迟、斐松之等先后担任永嘉郡守，使温州的农桑、造船、陶瓷诸业迅速发展。唐高宗上元二年（675 年）改郡名为温州，这是温州得名之始。唐代的温州，兴修水利、开发盐田以及与日本等国的民间贸易等，都有长足的发展，温州诗人张湮和高僧玄觉（永嘉大师），成为当时全国知名人物。宋代是温州经济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造纸、雕刻、漆器、刺绣、制药、皮革、绢绸等手工业闻名全国，与高丽、真腊（柬埔寨）、日本等国都有商船往来，“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南宋时的永嘉学派，四灵诗派，以及南戏均名闻全国。元、明、清时期，也曾有过短期的繁荣，平阳矾矿已开始开采，但明代因倭寇侵扰，清皇朝闭关锁国，致使温州历史上的光辉逐渐消退。清光绪二年（1876 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迫使温州开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温州变成“瓯为海国，市丰洋行”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温州的民族工商业有所发展，先后办起了制茶、织布、火柴、制革、炼乳、肥皂、印刷和机械等一批小型工业，温州城内约有大小商店 2000 余家。到了 1930 年，温州的进出口

贸易总值达到 1510.8 万两白银，温州港年吞吐量达到 30 万吨左右。晚清时期，温州出了陈虬、朱平子、陈介石、孙诒让等维新派人物。抗日战争初期，沿海大批城市均陷于敌手，温州成为东南沿海唯一出海口，全国各地客商及采办军需物资的人员，汇集这里，温州一度出现畸形的繁荣，1938 年港口吞吐量达到 80 万吨，比 1930 年增长近 2 倍。

与此同时，温州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浙南山区建立游击根据地，是中国南方 14 个革命战略支点之一。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温州也没能避免日寇铁蹄的蹂躏。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挑起内战，温州的工商业趋于凋敝，民不聊生。到解放前夕，仅有私营小型企业和手工业作坊 374 家，职工 5000 余人，生产力低下，工业产值 6423 万元，农业产值 2.53 亿元（折合人民币），港口吞吐量只有 16.74 万吨。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经过土改，城市经过民主改革，温州经济逐步恢复发展。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相继建设了化工、冶金、渔械、制药、拖拉机、造纸等中小工业企业，扩建了造船、织布、电力、地面砖、炼乳、木材等工业企业。1957 年全地区工业总产值比 1949 年增长 3.03 倍，年均递增 19%，农业总产值比 1949 年增长 1.15 倍，年均递增率 10.07%，港口吞吐量增至 166.66 万吨，比 1949 年增长 8.96 倍。

温州地处东南沿海前线，国家建设没有大的投入。1957 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使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1958 年提出总路线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严重错误泛滥开来。1959 年的庐山会议继续反右，雪上加霜，生产急剧下降，商品供应紧张，农村发生饿病流荒现象。1961 年贯彻调整的八字方针，温州地区党政领导采取一系列措施，压缩建设项目，调整投资结构，精简职工及城镇人口，允许农民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恢复农村集市贸易，对主要农副产品实行派购，对人民生活必需品实行凭票供应等等。到 1966 年全区粮食总产量恢复发展到 1181970 吨，是建国 17 年来收成最好的

一年，1964 年和 1965 年工业总产值分别比上年增长 14.2%和 11.63%，全区工农业总产值比 1956 年增长 41%。国民经济发展重新走上较为正常的轨道。全区交通除有传统的航运之外，仅有温丽、温台、温福三条普通公路沟通省内外各地，瓯江等 4 条水系没有一座桥梁。

我对温州是有感情的。从 1965 年到“文化大革命”被打倒，我曾代理温州地委书记。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我都情有独钟。

1966 年 5 月以后，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温州成为重灾区，国民经济面临全面崩溃，直到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工作重心真正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农村改革的“星星之火”在温州较早出现，经过漫长曲折之路，温州走上了经济社会建设的快车道。

当我再次踏上温州这块土地时，世事沧桑，令人感慨万千。这时，温州已被国务院列为全国 14 个对外开放城市之一。温州人发展自己的机遇到了，各种市场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而且越搞越大，成了全国著名的商品集散地。市场又带动了企业尤其是集体和民营企业的迅猛发展。温州经济真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78 年后，我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国策。改革的春风吹到了温州，温州犹如枯木逢春。城市中的街道作坊、农村中的乡镇企业，遍布城乡多个角落的个体劳动者、民营企业、专业市场，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浩浩荡荡的劳务输出大军走遍大江南北……原来不合法的现在合法了，原来不敢干的现在敢干了，原来躲躲藏藏的现在可以公开、大胆地干了。

温州人敢为人先，甩掉了思想包袱，勇敢地投身到商品经济的海洋中去。他们在发展商品经济的同时，也创造了诸如股份合作制、联户经营等新鲜经验，在全国产生了轰动。

于是，全国各地的党政干部纷纷到温州来参观、考察，一时之间形成了温州热。北京、上海等一批理论、新闻工作者，也纷纷到温州来调查、开研讨会、写文章。上海的《解放日报》最早提出了“温州模式”的提法。中共浙江省委的意见是，提“温州经济格局”为好。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过，模式就是一种形式、格式，不是说它是完美无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提“温州模式”也未尝不可。

“温州模式”是温州的人民群众创造的。用他们的话说，我们温州人搞改革是逼出来的，生产积极性是党改革开放政策解放出来的，还有温州人经商是有历史渊源的。温州几百万人挤在一个狭小的地方，过去与内地交通十分不便。但这个浙南沿海城市依靠自己一个不大的港口，历史上一直与中国第一经济大城市——上海往来很频繁;从这里走出去到海外经商谋生的人在浙江也是最多的。他们从上海，从海外学习并带回了经商和生产技能。不少人能在家庭小作坊里生产精巧的小商品。如当时制作皮鞋的原料牛皮是十分紧缺的。他们能够把一张牛皮用手工分割成薄薄的好几层，再衬上硬纸板，做成一双双式样各异、十分好看的皮鞋，由儿童妇女到车站、码头去兜售。

搞家庭经营，个人发家致富，这在当时只有“一大二公”才是社会主义的“左”的思想路线指导下是不允许的。“文化大革命”前我在温州工作时，也领导割过“资本主义尾巴”，但越割它长得越快，越割人民越穷，怨声越大。温州人聪明能干，不怕吃苦，要摆脱贫穷、追求富裕，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是如何正确引导温州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实在是一件左右为难的事情。“左”了，打击群众积极性;右了，要犯路线错误。这在当时是一个让我感到十分困惑的问题。解放十多年了，不少群众连温饱都没有得到解决。温州的面貌同解放初比起来，并没有多大变化，生产没有较大发展，人民生活没有很好改善。这同我们党搞革命的目的是不相符的。出路在哪里?这是不能不让人深思的问题。

我们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温州碰到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主要领导职务，温州，自然成了我最关心的地区之一。

人的思想认识是需要有个过程的。温州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强烈地冲击着人们的思想。有人大胆支持，有人谨慎赞同，有人强烈质疑，以至坚决反对。特别在干部队伍

中认识存在很大分歧。一些干部认为温州的做法有搞资本主义之嫌，不符合社会主义方向。对温州人民改革、创新的举措，这也看不惯，那也不顺眼，横加指责，甚至压制、刁难。为此，我有好几天晚上睡不着觉，我一直在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怎样才能统一我省各级干部的认识?怎样教育我们的干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正确对待新生事物?

在 1984 年 12 月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委七届二次全会扩大会议上，我们让温州市市长卢声亮作《民办工业的发展给温州城乡增添了生机》的发言。他指出：民办工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民办工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大力扶持民办工业的发展；要为民办工业正名；要为民办工业落实政策；要为民办工业提供服务。我认为这是符合本地和浙江实际的。这说明，中共浙江省委对温州经济发展的新路子从一开始就是全力支持的。

1985 年，中顾委一批老同志来温州参观后，到杭州来和我交换意见。他们一方面肯定了温州的做法搞活了经济，人民生活水平明显得到了提高；另一方面，又不无担心：这样做符合社会主义方向吗?这样搞下去的后果如何?这在当时是很多人都认识不清的问题。那时，全国有 20 多个省市的领导来过温州（后来，除台湾省之外，全国各省的党政干部都去过温州）参观考察，影响颇大。我们要对这些省市的领导负责，温州的做法究竟怎么样?如果是对的，会产生好的影响，是对全国的贡献。如果错了，这个责任中共浙江省委挑不起，建议省委能组织一个调查组，对温州的做法进行深入、具体、细致的调查，然后以中共浙江省委的名义给中央写一个报告。这样做，一方面，中共浙江省委对温州的问题有详尽的了解，做到心中有数，也有一个态度。另一方面，也是我党组织原则的要求，地方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向中央作汇报。如果是我们错了，可以及时得到纠正。如果中央肯定了温州的做法，则我们更加理直气壮。

我认真听取了这些老同志的意见，觉得他们的意见很有道理，也十分中肯。他们担心的问题我也深深思考过。温州的做法是错还是对，

要中央直接回答是不可能的，因为改革是在探索中前进的，允许成功，也允许失败。温州的做法就是一种积极大胆的探索。中央已经把政策交给我们了，就看我们敢不敢实践，敢不敢创新。应该说，我对温州的情况是清楚的，心里是踏实的。我到省委重新工作后，温州是我特别关注的地方，是我去得最多的一个地区。担任省委主要领导后，我每年总有两次到那里搞调查研究。温州市委也总是及时向我汇报各种情况。在中共浙江省委领导和支持下，以袁芳烈为书记的市委一班人以及后来的市委领导，在那里干得不错。温州正在发生历史性的深刻变化。省委为了更加具体地掌握并深入研究温州的问题，更好地指导温州的工作，决定叫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何荣飞同志去温州挂职任副市长。

在何荣飞将去温州上任的前几天，我在杭州大华饭店约见了他。给他布置了任务，告诉他，你去温州必须将温州经济格局作详细的调查研究，要有理有据，然后直接向我汇报。何荣飞同志告诉我说，他已抽调了中共浙江省委政研室两位同志，和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在职学习的同志，组成共一二十人参加的调查组，这次和他一同出发去温州。

调查组在温州调查了大约一个月左右，何荣飞同志回来过一次，向我作了汇报。我听了汇报以后，觉得调查已有了一定的基础，但还需要再提高。于是，决定组织中共浙江省委调查组，抽调了省委政研室主任马瑞康、省计经委朱家良、省工商局局长曹天玷等同志，由我亲自带队于 1985 年 8 月赴温州调查。

中共浙江省委调查组到了温州以后，先听取调查组的调查汇报。首先，由何荣飞同志作了一个综合性的汇报。接着，深入到十大专业市场作调查的同志，分别对乐清柳市电器市场、永嘉桥头纽扣市场等一一作了汇报。我们非常仔细地听取了汇报。

听完汇报后，8 月 20 日，我带着调查组同志首先考察了桥头纽扣市场。当时，桥头镇已有纽扣摊位 700 余个，产品来自全国 20 多个省、市 300 多家企业，每日成交额达十几万元人民币，年销售纽扣 30 亿粒，被香港媒体称为“东方第一大纽扣市场”。

说起纽扣市场的形成，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当时，桥头镇有两兄弟跑供销的，他们到了苏南一家国营企业，看到了一大堆纽扣丢弃在垃圾箱里。他们感到太可惜，就把纽扣捡回来，在桥头镇摆摊试卖。由于开价便宜，很快就卖出去了。兄弟俩受到了鼓舞，感到有商机可乘，于是找到苏南这家企业的领导，要求为这家企业推销纽扣。这家企业领导正愁纽扣卖不出去呢，便一口应承下来。兄弟俩在镇上的摊位越摆越大，生意越做越火。赚钱也使人眼红啊，镇上的其他人看到这家兄弟卖纽扣赚了大钱，也纷纷仿效。于是桥头镇上的纽扣摊位越摆越多、越摆越大，逐渐形成了现在这么大规模的纽扣市场。

许多来桥头纽扣市场参观的人都不解地问：桥头镇是个交通不便的、偏僻的山区小镇，为什么在大城市（如南京、杭州）都形不成这样的纽扣市场，而在这里形成了呢?这个故事解开了这个谜。

连经济学家都感到困惑的问题却被温州农民轻而易举地破解了。其中的奥妙在于：大城市是当时计划经济的顽固堡垒，虽有交通发达、设施先进等优势，但机制不活，人们积极性不高，经济就无法搞活。

就拿苏南那家国营企业来说，纽扣生产出来了却卖不出，只好丢到垃圾箱里。纽扣对他们来说，是废物；而对温州农民来说则是个宝。同样是一个纽扣，在计划经济框框内，成为一个死物；而在市场经济机制面前，它却活起来，会源源不断地转换为金钱。

桥头纽扣市场形成的历史，还令人信服地告诉我们：市场的形成与发展靠的是人，是农民供销员。他们是市场的营销主体。先有农民供销员，后有市场。是农民供销员的智慧与创造性，创立了市场并推动了市场的发展。农民供销员构筑了市场经济的大舞台，是市场经济的真正导演。我们各级党和政府官员的作用在于及时发现群众的创造，总结群众的创造，支持群众的创造。先当群众的学生，才能当群众的先生，千万不要自以为比群众高明，动辄加以指责。

8 月 21 日，我们一行冒着大雨来到平阳县鳌江镇，走进一条小巷深处，走访一家私营企业——平阳建筑起重机械厂。我仔细地向年仅 35 岁的厂长柳上庭询问企业经营情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柳厂长说，我这个厂子创办两年多来，势头不错。1984 年产值 118 万元，预计 1985 年可比去年增长 2 倍。厂里采购原材料、组织生产和销售都是靠自力更生解决的。有了效益后，除按国家规定缴纳税金，还捐资五六万元给村里造校舍、建老年保育场所等。

我对此表示自己的赞赏之意。我还笑着问小柳："你还有没有别的想法?"他腼腆地一笑，说："下半年想造一座新厂房，扩大生产规模，可是有人在说，你这样下去就会变成资本家。我别的都不怕，只怕被抓起来。"我肯定地告诉小柳:"只要是对国家、对人民有利，对发展生产有好处，就可以干嘛！个人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请你尽管放心，决不会抓你的。"

这一席话说得大家都笑起来。这时我还问了他一句:"你愿意同国家合营吗?"在场的温州市委领导补充道："国家以土地、建材入股，工厂仍由你管理!"柳上庭爽快地回答："这样太好了。"

8 月 22 日一大早，我们一行从鳌江镇坐船到龙港镇考察。龙港镇的前身叫白楼下，是个十分贫穷落后的地方，过去连讨饭的从这里经过都不会留下。当地有句民谣:"白楼下，白楼下，只见人走过，不见人留下。"两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杂草丛生的江边滩涂，而现在一座新兴的农民城在这里崛起，高楼林立，街道繁华。

这个镇的建设资金90%以上都是农民群众集资的,农民站起来了,有经商办企业的迫切要求，当地政府从长远规划考虑，确定相应的集资建城的原则,因势利导,由农民自己投资建设农民城,这是可行的。

我对温州市苍南县龙港镇的领导说：人民城镇人民建，这办法好。要搞好规划、加强管理。过去我们建一个县城，总是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中心放在一起，这叫不懂得城市建设。在外国，每个城市的功能是不同的，美国华盛顿是政治中心，而美国的财政经济中心却在纽约。城市、城市，顾名思义，就是"城"和"市"。过去，"城"是防御用的，"市"是交易用的。现在防御作用小了，"市"的作用大了，因此，城市建设重点要放在"市"上，要把交通搞上去。

在与苍南县钱库镇委同志座谈时，我专门了解了当地的九年制义务教育情况。我问他们：“你们这里小孩子读书的情况怎么样?”他们回答：“入学率是 94.6%。”我接着这个话题对他们说：“教育工作要抓紧呀!有些农民只看到眼前利益，一个孩子一天能赚几元钱，而真正要发展商品经济，非有文化不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人民生活十分困难，但教育仍然抓得很紧，所以经济复苏快。一个人有了文化，不管种田、做工、经商，样样都干得好。教育是百年大计，国家的兴旺发达与人的素质提高关系极大；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嘛。你们钱库集市贸易很活跃，但也要抓好精神文明建设。我们当领导的抓工作，千万不要抓了这一面，丢了那一面，要两手抓，两手硬呀!”

当天下午，我们一行又去考察铁龙乡的“农民服务社”。回来时，天很暗了，下起了倾盆大雨，车子又开不过来，我们赤着脚、挽着裤管，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赶路。

经过半个多月的实地考察，8 月 26 日，我在温州市科局以上干部大会上作了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我首先分析了温州农村经济的大好形势和发展趋势，同时着重肯定了温州农村经济发展的新路子，是温州人民创造的，是符合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给广大干部撑了腰、鼓了劲。

我说：温州农村商品经济的基本特点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家庭工业和联户工业为支柱，以专业市场为依托，以购销员为骨干，形成了不同于苏南和我省宁、绍地区的另一种经济格局。这种独特的格局，是由客观的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一是人多地少，单纯从事耕地经营，不仅不能致富，就连温饱也解决不了。二是城市工业基础薄弱，城市经济对农村的辐射力和吸引力不大，迫使农民就地发展商品生产。三是温州原有的集体经济力量薄弱，缺乏资金技术，只能靠农民自身力量发展家庭经营。四是温州处于沿海地带，人们历来有经商的传统，有一大批能工巧匠和善于经营的能人。

我指出：特别值得肯定的是，温州各级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从这些客观条件出发，找到了一条符合温州农村实际的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

济的新路子。这条路子为其他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新经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经验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

我们很多城市几十年一贯制，面貌得不到改观。原因在于：城市建设靠国家投资，渠道单一，财力有限。而龙港镇的建设方针是，人民城镇人民建。投资主体靠的是民间投资。发展商品经济，城镇比农村有更多优越的条件。苍南一带富裕起来的农民，想集中到城镇来更好地发展商品经济，自然会踊跃投资。农民踊跃投资建设龙港镇，这个现象引起了我的深思:农民要求突破商品经济发展的空间限制，要求进城。城市化在中国是个必然的选择，温州农民已经率先呼唤城市化。

温州的做法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温州的经济符合不符合社会主义方向?这不仅在我省各级党政干部中有疑虑，私人企业主也有沉重的思想包袱。这是一个必须回答、回避不了的问题。

针对这个疑虑，我肯定了温州的做法符合社会主义方向。其理由是：

一是有利于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家庭功能，发展社会生产力。从温州的情况看，家庭经营具有许多内在的优势，农村家庭这种经济功能只要引导得好，可以成为社会化大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是有利于商品经济的要求，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搞活城乡经济。温州十大专业市场的形成就说明了这一点。

三是有利于加快农村小集镇的建设，逐步形成新型的城乡关系，龙港镇的崛起就说明了这一点。

四是有利于造就一大批懂技术、善经营的人才。温州城乡跑一跑，就可以看到一大批这样的人才。

同时，在报告中我也指出，以家庭经营为主的经营方式有其固有的弱点和局限性，今后需要深入探讨和正确引导。在报告中，我特别强调了两个文明一起抓，温州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在当前和今后都必须抓精神文明建设。

不久，我把赴温州调查的素材，经过整理加工，写成《温州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调查》一文，发表于《红旗》杂志 1986 年第 3 期上。这篇调查报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调查报告发表后，说温州是搞资本主义的议论大大减少了。不少党政干部的认识有了提高。温州地区的各级党政干部说他们的腰杆子硬了。尤其是个体户、私人企业主奔走相告，说：省委书记为我们说话了，我们可以甩开包袱大胆地干了！温州再一次掀起了发展商品经济的热潮。

然而，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温州商品经济的发展也经历了一波三折。波折来源，从温州本身来说，发展商品经济有一个从不规范到规范的过程。温州商品经济发展的初期假冒骗时有发生，伪劣产品充斥市场。温州市的领导提出了“质量立市”，曾在杭州武林广场当众销毁万余双劣质皮鞋，加强了打击假冒伪劣的力度。过去，“温州制造”遭人唾弃；现在，“温州制造”成了抢手货。

温州商品经济的发展，还与我国政治的大气候有关。1992 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温州商品经济发展迎来了第二春。温州的经济模式不仅在我省，而且在全国开花结果。对温州模式的指责已烟消云散。温州不仅是片充满希望的热土，而且把希望传到了全国各地。

（作者曾代理温州地委书记兼温州军分区第一政委，

曾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对温州第一阶段改革的回顾

郑嘉顺

温州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粉碎“四人帮”后的最初两年，在两个“凡是”的思想指导下，仍是死水一潭。1978 年，我调回温州地委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指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要把它具体化，就必须从温州实际情况出发，走自己的路。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村生产力获得飞速发展

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所有制，严重地束缚了农业生产力。要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关键在于使农民有自主权，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这就只有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我们统一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后，在全地区大胆放手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0 年，温州农村成了全国最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地区之一。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粮食大幅度增产。农业生产关系的完善，农民真正当家做主，生产积极性高涨。他们说:“交了公粮，缴了集体提留，其余都是我的。”加上中央又适当提高了粮食征购价格，增加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供应;全区大力推广以种植杂交稻为中心的新技术，还有其他开放搞活的措施等，使农村生产力获得了飞速的发展。从 1981 年到 1983 年，全区每年都增产 10 亿斤稻谷，3 年就增产了 30 亿斤。而解放以来长达 31 年间，全区才增产 10 亿斤稻谷。温州人多地少，每人平均只有半亩地，但这时的粮食却自给有余。有了粮食心中不慌，大局就稳定了。第二，农业承包后，工效数倍提高，全区农村多余出 150 万左右的劳动力。这批劳动力应该采取什么模式，向什么方面转移，成为温州农村经济改革与培育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问题。第三，农业成功的改革，推动了农村其他各业的改革。首当其冲是林业了。过去是年年造林不见林，损失较大。这次林业改革比较慎重，对不同情况区别对待。适宜集体经营的大片山林，仍坚持集体经营，内部采取承包改进分配比例，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对于小片林地和宜林荒山则由户承包。温州渔业在农村经济占较大的比重，而且影响市场经济和人民生活。随着农业改革搞起了以船为单位的承包制，并发展联户或家庭的近海“流刺”作业以及滩涂养殖业。

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所谓“温州经济模式”，我归纳起来是四句话:农村改革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农业的发展为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创造了条件，农村非农产业的大发展为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市场经济的发展又为农村城镇化创造了条件。

80年代初期的温州农村改革，带来150万左右劳动力需要转移到其他各业的问题。在农村发展开发性的种、养业，安排了一些，但数量有限。乡镇企业较少，安排不了，而城镇还有近20万青年待业，农民根本不能进去。我们经过反复调查研究，确定两个方面:一是大力发展家庭工业和联户工业，发展商品生产;二是动员能工巧匠到全国各地去做工或经商。

于是，家庭工业和联户工业很快就发展起来。金乡几乎家家户户都生产标牌。宜山再生布、袜、帽，直至棉毯等，都家家户户生产。麻步的编织袋，从平原开始扩大到山区。塘下五金、标准件，梅头羊毛衫更是遍地开花。仙降各类鞋子从家庭、工场，形成总公司。柳市的低压电器从前店后厂，扩展到大半个区家庭进行生产。桥头的纽扣还从永嘉农村发展到青田的海口。

农村劳动力外出转移取得很大成果，有包修水坝、修公路工程，甚至下井挖煤，弹棉、补鞋、理发、成衣更是走遍全国，而且从工业、手工业逐步向商业转移。他们自豪地说:“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及其产品;没有人烟的地方，也有温州人留下的足迹。”据不完全统计，那时外出的劳动力就达10万多人。

随着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冲破了自给自足的落后格局，全区虽然有数百个农贸市场一片兴旺，但远不能满足商品销售的要求，而依靠全民所有制的商业和供销社又解决不了问题。这样，农村发展商业就出现了两件新鲜事物，也可以说中国大地上出现的两种商业新形式。第一是专业市场。这些专业市场都设在家庭工业发达、交通又较方便的地方。如金乡的标牌、宜山的纺织品、麻步的编织袋、仙降的鞋类、塘下的五金标准件、梅头的羊毛衫、瓯海的服装皮件、柳市的低压电器、桥头的纽扣等等，面向全国销售，并以专业为主兼营多种小商品。第二是10多万供销员。他们以温州商品市场尤其是专业市场为“根据地”，面向全国开展供销经营活动。他们是温州市场主要的构筑者，是沟通当地市场与全国各地市场的桥梁和纽带。他们既担任推销温州商品，又担任签订全国各地生产所需的订单以及供应温州家庭工业部

分的原料。在 80 年代初期，温州农村家庭工业、专业市场、供销员“三位一体”的结构中，供销员的作用是关键性的。假如没有这支供销大军，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都不可能发展起来。这些供销员是民间商人群体，是属于第三产业部门，但他们不固定在一个地方经商，而是在温州与全国各地之间穿梭往来;为温州家庭工业服务的具体对象也并不固定，而是利益互惠的随机结合。

农、工、商业发展起来，交通运输业滞后的矛盾就更加突出了。人民要求修铁路、修公路、修桥、买车、买船。这些，单靠国家办是做不到的，我们就决定支持人民办交通运输业。在短时间内，内河挂机船新增 1000 多条，上千辆汽车也买到了，还办起了外海货船，农村也修了一些桥梁。1982 年修建瓯江第一座桥，几年就收回全部投资。交通运输得到缓解，农村数万劳动力也顺利得到转移。

农村各业的发展资金主要靠群众自我积累解决，因国家银行贷款的总额以及存、贷款的利率，地方政府无权过问。我们就从农村信用社的存、贷款利率的改革入手，使利率高于银行、低于民间借贷，从中组织了一部分资金，这既缓解了农村发展生产资金的困难，也为信用社发展创造了条件。但由于我们在金融改革方面缺乏经验，抓得不力，在 1984 年以后，乐清等部分农村发生“抬会”事件，教训是深刻的。

随着工业迅速发展，技术引进以及资本的原始积累，经过组合、扩建，开始出现了一些上规模的带有股份制形式的企业，产品也从初级逐步提高，这就需要有功能比较齐全的城镇作为产业发展的依托。1984 年出现苍南县龙港镇的崛起。1979 年全市只有 18 个建制镇，1984 年就发展到 33 个。

温州农村的改革同时也推动了城市改革

温州农村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推动了城市的改革。我们抓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切实把中心工作转变到发展经济上来，重点发展基础设施;二是以解决城市青年就业为契机，完善生产关系的改革。前者我们抓东屿 5 万千瓦电厂的建设，增加农村供电；新建状元煤码头和

散装码头；扩大东门客运码头；扩建市区和县城自来水厂，以及拆建城市交通的死角，畅通客货流量。1979 年，城区数百失业青年先后上访，要求政府解决就业。为了解决近 20 万城镇失业青年，我们参照农村改革的经验，除了由效益较好的全民企业办集体工厂外，放手发展家庭工业和街道工业，发动青年办第三产业。对于不景气的全民和集体企业，允许职工有领导地搞第二职业。这样，失业和半失业基本上解决，产值每年都成倍地增长。由于城市条件比农村好，很快就形成皮鞋、皮件、五金电器以及打火机等专业市场。人民收入增加，生活改善，治安秩序稳定了。为城市全面改革打下了基础。

总之，温州市场经济比较发达，是由于较早地实行农村改革，并从实际情况出发，在发展商品经济时，在 80 年代初期形成家庭工业、专业市场、供销员“三位一体”结构。这是发展商品生产的捷径。我们的体会是:

第一，中国是落后农业占主体的国家，改革应先从农村开始，依靠农村逐步发展商品经济，促进分工分业，这样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以及农村城镇化的进程。

第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他们有了自主权和积极性，就会创造出奇迹。所谓“温州模式”，是数百万温州人民智慧的结晶。作为党的领导者的责任就是通过实践给予支持、推广、总结与提高，并为人民解决具体困难。

第三，要正确看待全民所有制比例问题。温州交通不便，经济基础很差，而且五六十年代是前线、六七十年代是火线（指“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武斗）的地方，国家资金不可能大量投入，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很少。在温州发展经济，要组织全民参加，通过发展经济，积累资金，再发展经济，走滚雪球式的道路。只要生产力发展了，国力增加了，全民所有制比例少，并不会影响大局，况且加上集体所有制比例还是占多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